

# 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

(书稿)

刘华文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总  
序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总  
序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5年9月18日于南京大学





# 目 录

|            |                                    |     |
|------------|------------------------------------|-----|
| <b>第一章</b> | <b>导论</b>                          | ／1  |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3  |
|            |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所要拓展的领域                  | ／8  |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策略                        | ／10 |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构型                        | ／20 |
| <b>第二章</b> | <b>经验和先验——中西诗性话语在翻译中的异向交汇</b>      | ／23 |
|            | 第一节 逻各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先验性核心范畴           | ／25 |
|            | 第二节 “be(是)”——“逻各斯”在西方语言中的先验性<br>表征 | ／30 |
|            | 第三节 中西语言——“道”与“逻各斯”之差异性的负载物        | ／32 |
|            | 第四节 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诗性语言观                 | ／39 |
|            | 第五节 中国古代诗性语言观念的主流——道家美学语<br>言观     | ／48 |
|            | 第六节 西方存在论美学——“逻各斯”和“道”的会通          | ／52 |
|            | 第七节 经验与先验——中西诗性话语在翻译中的异向<br>交汇     | ／54 |

|            |                          |      |
|------------|--------------------------|------|
| <b>第三章</b> | <b>汉诗英译的创造性审美思维</b>      | ／61  |
| 第一节        | 汉诗英译的审美判断模式之争：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 ／64  |
| 第二节        | 从审美客体到审美对象——汉诗英译中审美质的提升  | ／82  |
| 第三节        | 汉诗英译主体的两种思维方式——概念思维和经验思维 | ／92  |
| 第四节        | 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同和相通            | ／104 |
| 第五节        | “无我”之一和“有我”之异            | ／109 |
| <b>第四章</b> | <b>汉诗英译主体的审美意向性结构</b>    | ／113 |
| 第一节        | 意向性理论与诗歌翻译的主体性           | ／116 |
| 第二节        | 汉诗英译中主体的审美意向模式           | ／126 |
| 第三节        | 汉诗英译中的审美意向性和审美非意向性       | ／152 |
| <b>第五章</b> | <b>汉诗英译的审美感应过程</b>       | ／157 |
| 第一节        | 从创作审美感应到翻译审美感应：主客间性和主体间性 | ／159 |
| 第二节        | 汉诗英译的主体间性审美感应方式          | ／165 |
| 第三节        | 汉诗英译审美感应过程中的“他本感应”       | ／167 |

# 目 录

## 目 录

- 第四节 汉诗英译审美感应过程中的“我本感应” /175
- 第五节 汉诗英译审美感应过程中的“他我融合感应” /181

### 第六章 原文和译文的认知同一性关系——汉诗英译主体审

美介入的结果 /197

第一节 汉诗英译的认知同一关系 /201

第二节 汉诗英译中的认知转换特征——常规性认知转  
换和非常规性认知转换 /208

第三节 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介入形式 /210

第四节 汉诗英译中原文和译文认知同一性关系类型 /229

第五节 汉诗英译中的同一性梯度和审美性梯度 /245

### 第七章 汉诗英译的审美原动力——审美辩证法 /247

第一节 翻译审美辩证思想建立的前提——消解“逻各  
斯中心主义” /250

第二节 跨语性审美辩证和文本性审美辩证的关系 /252

第三节 从单语创作的审美辩证运动到跨语翻译的审美  
辩证运动 /254

第四节 文本性审美辩证关系在汉诗英译中的嬗变 /260

第五节 汉诗英译辩证审美运动的主体性特征 /277

## 目 录 Contents

|            |                            |      |
|------------|----------------------------|------|
| <b>第八章</b> | <b>汉诗英译的审美主体性综述</b>        | ／281 |
|            | 第一节 诗歌语言的指向性定位与诗歌翻译主体的关系   | ／283 |
|            | 第二节 诗歌翻译的主体性角色定位：一个语言哲学史考察 | ／291 |
|            | 第三节 认知性主体在汉诗英译中的体现：以‘时间’为例 | ／301 |
|            | 第四节 原译文的同一性梯度与翻译主体性身份之间的关系 | ／314 |
| <b>第九章</b> | <b>结论</b>                  | ／317 |
|            | 第一节 问题的系统性梳理和相应的结论         | ／319 |
|            | 第二节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325 |
|            | 参考文献                       | ／329 |
|            | 后记                         | ／337 |

## 第一章

# 导 论



对于日常语言来说,传递信息是其主要的成文和解文目的。相应地,这种文本的翻译也是本着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运用着等意、等值和等效的翻译手段的。到了文学性的文本,翻译主体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文本内容,因为文学性是不能简单地被减缩为纯形式的、纯结构的在场的存在物。文学文本的这种拒绝减缩的特质让翻译主体面对着在译文中维持原有的文学性的种种困难。诗歌作为最高一级的文学文本,其中所蕴涵的诗意、诗质和诗性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能被成功地运载到译文这个目的地,诗歌这三种特质的保持过程的关键在哪里就成了本书所关注的焦点。

## 第一节

# 文献综述

针对英译汉诗的批评几乎是同汉诗英译的实践同步进行的。英译汉诗诗集一经出版就会引起读者和评论者的注意。1921年出版的、由美国女诗人爱米·洛威尔(Amy Lowell)翻译的中国古诗英译集《松花笺》<sup>①</sup>一面世,即成为议论的中心,褒贬不一<sup>②</sup>。20世纪上半叶掀起了一股汉语古诗的英译热潮,像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的《李白诗集》、庞德的《华夏集》、蔡廷幹的《千家诗》等相继问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故著名

<sup>①</sup> 周彦,“《松花笺》——忠实与创新的结合”,《中国翻译》,1996年第4期。

语言学家吕叔湘辑录了这一时期的英译汉诗,编纂成《中诗英译比录》。他在本书的开篇序言中对汉诗英译的实践做了详尽而经典的总结,并且触及了汉诗英译尤其是外国人英译汉诗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他在此文中谈到了翻译者的诂诂的准确性,认为“前期诸家多尚‘达旨’,有所不解,易为闪避;后期译人渐崇信实,诂解讹误,昭然若晓。”<sup>①</sup>吕先生接着仍然是以纠错的方法指出了英语和汉语由于句法上的差异而存在于英译汉诗中的补出主语的现象,这样就出现了由于原诗中主语不明而造成所补出的主语错讹的结果。吕先生继续从语言形态上、诗体对应上指出英译汉诗的弊病所在。这篇序言同时也谈到了诗歌翻译的变通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的介入。但吕先生依然是在借助原文和译文之间信息量的增减来看待变通问题。在他看来,“意义变通有三,或相异,或省减,或增加”<sup>②</sup>,没有就变通在审美质上对译文造成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说明。吕叔湘在《中诗英译比录》的这篇序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诗歌英译研究的代表作,即使到今天仍然值得诗歌翻译者和诗歌翻译的研究者借鉴。

在吕叔湘发表此篇序言之前,闻一多先生就已经在《北平晨报》1926年6月3日的副刊中撰文评述了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 The Chinese Poet*)。纠错的批评倾向依然在这篇译文中体现了出来。不谈译文的审美性或不上升到非纯形式意义上的审美层次是这个时期评论译诗的论风。尽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译论停滞了,但是此后重新兴起的诗歌译论也依然承继这样的论说方式。如果说吕叔湘、闻一多等老一辈的译论家以

① 吕叔湘编,《中诗英译比录》,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② 同上,第17页。



译文相对原文的忠实度来评价译文的优劣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诗歌译论则把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文拿来对比,指出其中的优劣高下。裘克安的“李白《送友人》一诗的英译研究”一文<sup>①</sup>和高健的“再评《送友人》的几种英译”一文<sup>②</sup>采用的都是这种评论模式。

刘重德先生在他的《文学翻译十讲》中专辟一章谈诗歌的翻译<sup>③</sup>。在他看来,保持译文的诗性和忠实于原文之间存在着难以取舍的两难。无独有偶,旅美学者刘若愚先生在他所翻译的李商隐的诗歌集中也谈到了诗歌的意译(free translation)和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问题<sup>④</sup>。他们都处于忠实原文和美化译文的两难处境之中,但都又更看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这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忠实原文的标准更容易找到,只要把原文的意义还原成客体性的存在物就可以了。他们其实也以相同的手段为美找到了标准。参照这个标准人们就可以判断译文的美与不美。所以,译者对诗歌美学层面上的还原多集中在客体性的、显性的美的形式上面。许渊冲先生就提出了诗歌翻译要重视三美:意美、形美和音美<sup>⑤</sup>。这里所谓的‘三美’都是客体性的存在物,译者的任务就是在原诗中发现这些美并且在译文中再现这些美。这些美是具有相同的鉴赏力的读者所共有的,不具备个体性、瞬间性和临时生成性,也就是说没有个体上的差异。这样,美的客体性就压倒了美的主体性。表面上看,译者在这里已经开

① 参见裘克安,“李白《送友人》一诗的英译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② 参见高健,“再评《送友人》的几种英译”,《外国语》,1993年第6期。

③ 参见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128—160页。

④ 参见Liu, James J. Y.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 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40.

⑤ 参见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52—74页。